

百年中国哲学革命

Bainian Zhongguo Zhexue Geming

许全兴 著

 人民出版社

百年中国哲学革命

Bainian Zhongguo Zhexue Geming

许全兴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孔 欢

封面设计:吴燕妮

版式设计:姚 雪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国哲学革命/许全兴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

ISBN 978-7-01-013982-1

I. ①百… II. ①许… III. ①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3330 号



百年中国哲学革命
BAINIAN ZHONGGUO ZHEXUE GEMING

许全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2

字数:663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982-1 定价:89.9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告读者的话

本书目录表明,它并非是对百年中国哲学革命所做的一般历史阐释,而只是对百年中国哲学革命研究中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与争鸣,希冀以此推进百年中国哲学革命的研究。

本书所论立足于当前的哲学革命,注意吸取和继承前辈的成果,克服其遗留下的不足,希冀有益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历史上的哲学革命虽已成为历史,但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并未消失。本书所论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希冀有益于推进现实的思想文化革命及社会发展。

基于上述三点,作者认为,本书不仅对哲学研究者和近现代史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一般的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认识当代中国的理论建设和文化论争亦有助益。

百年中国哲学革命是一个时代课题,本人才疏学浅,重在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学术界、思想界同仁的思考与争鸣,不妥之处,敬请诸位不吝指正。

代绪论 百年中国哲学的三次革命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而作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今年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大变革时期,先后发生三次社会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奋发图强的建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过去几百年以至上千年未曾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和惊叹。

哲学虽处于社会意识的顶端,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与三次社会革命相适应,中国哲学也发生了三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经历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现代中国哲学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正跻身于人类先进哲学思想之林,愈来愈引起世界人民和哲学家们的关注和重视。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实际,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但对历史的回顾则因回顾者的观点和视角的不同而不同。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本文拟从哲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视角对百年中国哲学的三次革命作一勾勒,以就教于同仁。

一、百年中国哲学第一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一个历史过程的话,那么1898年的戊戌变法则可以视为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从哲学史、思想文化史看,戊戌思潮则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文化革命的酝酿和准备。

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想仿效俄国、日本,进行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以挽救中国的衰亡。他们学习和吸取西方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科学,为变法维新创制思想武器。他们的政治理想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没有能冲破中国传统的藩篱,还迷信孔子,穿着古人的外衣,托古改制,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他们主要依据传统的“变易”哲学和“公羊三世”学,批判“祖宗之法不可变”,鼓吹变法自强。他们对达尔文进化论有所了解,但甚为肤浅(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直到1898年才正式出版),主张渐变的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进化论。他们是我国最初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们的一只脚已跨进了新的时代,一只脚却依然停留在旧的世界。如梁启超所言,他们“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他们的思想是“西学附缘中学”、“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①。由此看来,康有为等人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尊孔保皇、反对革命共和也在情理之中。

1898年的戊戌变法遭到反动清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唯有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革命大旗,同反对革命的保皇派进行论战,领导武装起义,十起十落,百折不挠。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清王朝的灭亡,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载《清代学术概论 儒家哲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6页。

有伟大的历史意义。”^①革命是由反动清政府逼出来的,决非资产阶级革命派喜好暴力和流血。“告别革命论”者无视历史的本质和真实,否定辛亥革命,实是对历史和革命先辈的亵渎,是一种非历史主义。辛亥革命后不到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如此迅速成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了较多的译介、传播,达尔文进化论风靡思想界。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精神武器完全是现代的西方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已抛弃了古人的外衣。他们秉持革命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改良主义,大倡“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②,革命救国论盛于国中。那时革命派忙于同改良派的政治论战和从事武装起义的实际斗争,无暇顾及哲学问题的研究。但他们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中体现出的主体自主精神、奋斗牺牲精神、践履精神和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等哲学思想是极为鲜明的。章太炎是名震当时的革命家和学问家。他在论战中提出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③和“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④等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着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他们以自由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做武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国民性中的奴化意识,倡言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疾呼国民性改造。其中尤以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影响为最大,激荡着当时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新民说”,今天读来仍有启迪,仍有价值。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章太炎、蔡元培等自觉把西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介绍进中国,中国的大学正式开设哲学课,设立哲学系,

① 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年9月14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② 邹容:《革命军》(1903年),载《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③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载《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④ 章太炎:《答铁铮》(1907年),载《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1页。

开始有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专门家,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哲学自觉和哲学思想,推动了中国哲学的革命。其中值得特别一说的是王国维。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是“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其“所志者,真理也”^①。他继之认为,哲学实综合研究真、善、美三者,为中国固有之学;外国之哲学与中国之哲学并非不相容,而是相兼通的,有研究和介绍之必要。他研究和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并运用它们研究中国哲学和《红楼梦》,研究美学,提出美学境界说。他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和伦理学,力主在大学开设哲学课,批驳反对开设哲学课的守旧论。他称:“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哲学不可不特立一科”^②。经蔡元培等人努力,辛亥革命翌年,北京大学成立哲学门。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思想启蒙运动在先,政治革命在后,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政治革命在先,哲学革命相对滞后。在辛亥革命后,哲学革命继续进行着。

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成果是孙中山哲学,其中尤以知行学说为代表。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政权很快为代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军阀所窃取,共和国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失败了。作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对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哲学反思和总结,于1919年发表了《孙文学说》。他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党人中了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的毒,因而“信仰不笃”,“实行不力”。为此,他提出“知难行易”学说与之相对立。他从人类认识史上说明“不知亦能行”、“能行必能知”和“能知必能行”。他一方面强调行的重要,论证人们通过“练习”、“试验”、“探索”、“冒险”等实践活动,行其不知以致其所知;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知的指导作用,强调精神和意志的决定作用,强调知(认识世界)的艰难过程。但他缺少辩证法,没有能前进到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得出了知行分任的错误结论。孙中山的知行学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论证了知难行易,而在于它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知行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总结,提出了现代形态的知行学说,

①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载《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年),载《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将中国古代知行哲学提升到现代的新水平。孙中山未能完成的知行统一的历史任务则由后继者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得以完成。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革命前革命派对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没有足够重视,思想启蒙不力,因而没有形成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人民普遍不觉悟。辛亥革命后,封建旧思想仍遍布国中,出现了尊孔复辟的逆流。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对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补课,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总清算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科学和民主的意识得到广泛传播,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在此之后,谁再想恢复儒家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都不过是痴人说梦,枉费心机。

新文化运动的哲学武器依然是西方进化论的发展观。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认为,孔子之道,虽在中国古代诚属名产,有其价值;但社会是进化的,孔子之道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为了建设适合时代潮流的新社会,将中国从黑暗专制引向光明民主,必须输入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他们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感染力,但从学理上讲,都比较幼稚、粗疏,没有能形成如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完整的哲学体系。这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幼稚和不成熟。

二、百年中国哲学第二次革命：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

当人类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世界各国联成一气,中国革命成为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的反帝反军阀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新的社会革命相适应,中国哲学界亦发生了新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无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是紧随资产

阶级哲学革命而发生的,并在时间上两者有很大的交叉。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准备不充分,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准备同样是不充分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宣传的重点是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他们努力用初步学得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指导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李达、瞿秋白等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堪称为这一时期最具水平的哲学代表作。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讲课和《社会哲学概论》等则首次将在俄国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由于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急需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出现了高潮。李达、艾思奇、陈唯实等哲学家冲破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译介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唯物辩证法席卷中国思想界,成为当时哲学界的主潮。这一时期的著作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影响为最大,最具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为尔后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作了理论准备。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片面性日益为文化界所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时期。理论界、文化界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而且还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是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中,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任务,哲学家艾思奇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毛泽东则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哲学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是革命家、军事家,又是学问家、哲学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哲学,博古通今,融合中外。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因而能比其他革命领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能把握住革命的方向,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主

张,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使革命得到发展和胜利。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采访毛泽东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有自己的“哲学体系”^①。斯诺的结论为尔后的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三者的结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化。他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善于把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尤其是革命战争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哲学理论。他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社会尖锐、复杂和曲折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哲学上的反映。毛泽东继承中国哲学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和人身修养的传统,他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名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凝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领袖,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同于书斋中专门哲学家的哲学,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观、价值观,直接指导着中国革命,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已不能担当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它仍是革命的动力,起重要作用,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尤为突出。与此相适应,在无产阶级哲学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哲学革命仍在继续。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新文化运动存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缺乏辩证态度的缺点,形式主义地否定一切。梁漱溟忧虑中国文化中断,便公开为孔子辩护,建立融合儒家哲学、柏格森哲学和佛学唯识论为一体的文化哲学,借以论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走向应是孔家的道路,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向现代转化的先河。

如果说孙中山和新青年派分别从知行关系和思想文化上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各自的总结,那么,熊十力则从道德、价值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哲学反思。熊十力本人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67、68页。

革命党人的“竞权争利”。于是他决计改“政治救国”为“学术救国”，力图融汇“中国、印度、西洋三方思想”，“明是非”、“正人心”，创立新唯识论。熊十力是现代自觉创建有自己特色哲学体系的第一人。新唯识论在当时哲学界的影响甚微，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哲学自觉意识的提高。新唯识论对后起的港台新儒家有开山之功。

梁漱溟、熊十力虽然想吸取西方哲学，但他们本人并未留学外国，因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是空泛的。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方面，留学欧美、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们则与梁、熊有显著不同。他们在现代西方哲学主导下改造和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中影响较大者有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贺麟的新心学等。他们的哲学虽然流派各异，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外国哲学中国化的成果，都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哲学自觉、逻辑思维和道德境界有着积极意义。

“逆境出哲学”（毛泽东语）。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将得到最大的激发和释放。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在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哲学家们无不以哲学为武器，殚精竭虑地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尽一份力量。无论是占主导地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是其他的哲学思想，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智慧。

三、百年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旨在建立、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其中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此相应，中国哲学也发生了第三次革命，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此次哲学自我革命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主要是革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命，革从苏联传入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命，以建立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这时起,毛泽东试图打破苏联的框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哲学上,为了解放思想,他大讲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以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看成是第三次哲学革命的发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苏联社会矛盾的暴露,毛泽东对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国哲学家搞的是“洋哲学”,而不是“土哲学”,明确提出要改造现行的哲学体系。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陷入迷途,他提出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自然不可能完成。造成毛泽东晚年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无疑是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次哲学革命真正进行是在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与哲学的变革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潮流的推动和鼓舞,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现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和革命,哲学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是全面的、深刻的,涵盖了哲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功能、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哲学家自身诸多方面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哲学家的独立自主人格在逐步确立,哲学家的创新意识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在不断展开和深入。三十多年来,实践理论、主体理论、认识理论、辩证法理论、生产力理论、价值哲学、人学理论、发展哲学、生态哲学等取得了显著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主张和学派,除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一派之外,还有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类哲学、文化哲学等学派。张岱年对草创于20世纪30—40年代的综合创新唯物论进行了新的阐扬。他的综合创新论对新时期的哲学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契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三者冶于一炉,形成自己独特的“智慧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卷)。“智慧说”突出了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我国专门哲学家创建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值得哲学界重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革命并不是要否定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而是作为一种发展环节的辩证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是革教条主义的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指导下,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总结和概括20世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和概括当代科技革命新成果,总结和概括百年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经验,总结和概括当代世界哲学及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总结和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正在进行之中^①。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整个中国哲学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外,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学等学科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居主导地位,但并不是唯一的当代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界已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三者互动的态势。有志于献身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们在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结合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尤以张世英的“万物一体”的希望哲学(其代表作为《哲学导论》)和张立文的“和合学”为最有代表性。笔者虽不完全认同这两位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但充分肯定他们的一家之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价值。

经过自我革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摒弃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教条,不仅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有不同的学派,而且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流派哲学的共存与竞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流派哲学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矛盾和斗争,又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同一,它们之间的相互争鸣、相互学习将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的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正展现为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斗奇争妍、五彩缤纷的百花园。

^① 参见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四、百年中国哲学的两大不足

回顾过去的百年,我们可自豪地说,中国哲学革命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要超过以往的上千年。那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中国思想文化中断”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要充分估计在过去百年里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在过去百年里中国哲学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

过去百年的历史证明,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既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哲学,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否则会上走邪路,带来灾难。

我们在充分肯定 20 世纪中国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这种不足,从客观上讲是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所致。从主观上讲,一方面是哲学家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吸取均不够全面、深入;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家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知识和成就缺乏应有的了解所致。

现代中国哲学存在的不足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对逻辑思维和自由这两个方面的忽视尤为突出。以下略述之。

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以知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认识论研究。如前所述,孙中山、毛泽东都善于从知行上总结革命经验,把知行学说发展到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认识论至今仍有高出于同时代的认识论之处。但自墨经中绝之后,与西方哲学相比,我国逻辑学不发达乃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虽然西方逻辑学引进中国,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有很大提高,但总的看来,逻辑思维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哲学界对逻辑思维的研究很不够。毛泽东是重视逻辑学的,重视逻辑思维的,号召干部要“学点逻辑”,但他讲认识论主要是讲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矛盾运动,而对感性认识如何上升到理性认识只讲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未能像专门哲学家那样深入到理性思维如何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的具体过程(其实这是认识论中最为复杂的内容)。也许因感到这种不足,1961 年,他

在庐山与李达会面时提出要研究辩证逻辑问题。毛泽东在晚年自认为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而实际上却陷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究其认识论根源则主要是经验主义。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理论凸显,强调在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开创新路。这完全必要和正确,但由此也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对理论和理性思维的忽视。中国的理论界、哲学界只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能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而忽视了逻辑力量同样也是不可抗拒的,正确的理论将纠正一切错误的实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世致用,这一优点同时也蕴涵着轻视理性和理论思维的不足。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不发达至今仍严重影响着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严重影响着领导者们的宏观的战略决策。当代中国哲学亟须加强逻辑思维的研究,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

现代中国哲学革命存在的另一明显不足是对自由的忽视。哲学不仅爱智慧,是智慧之学,而且爱自由,是自由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传统,将“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者争自由、谋解放的思想武器。但由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注重世界观、方法论,却忽视了价值观,忽视了自由、人道、人权等内容。这种不足一直影响到现在。

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了自由,而且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鲜有论及自由和个性解放。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摧残个性,缺乏自由、民主传统,国民性中的奴化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伦理道德的优点是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上,主张社会本位,其缺点是忽视了个性自由。如李大钊所言,儒家的修养,“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①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三纲,批判奴性,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然而,冯友兰的境界说则强调个人完全服从社会和宇宙,“尽伦尽职”,以进到物我一体的天地境界,成为圣人。贺麟的“新五伦观念”则强调“三纲说”为核心,个人应“绝对遵守其份位”,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他们这种无个人自由的人生哲学的缺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片面理解,自由、人道、人权、人性、个性等成为禁语,以致广大国民长期对自由、个性、人道、人权、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无有了解。这种思想观念的普遍缺失是导致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非人道现象的重要缘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民主化的观念得到提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已成为共识。然而自由依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自由化仍是一个贬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由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熊十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通信中曾指出:古代移孝作忠,“奴化人民”。“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①遗憾的是,在当今国学热、尊孔热、读经热中,许多学者缺乏这种清醒的深刻的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奴化意识的缺陷,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有现时代的自由、民主精神。笔者一再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继承和发扬,孔夫子不能丢,但尊孔读经不可取,有背时代潮流。少儿读经,决读不成一个现代人。中国传统文化亟须吸取现代的科学、自由、民主等精神,否则只能为时代所淘汰。

笔者在此提出百年中国哲学革命的这两大缺失,旨在希望学界同仁加强对逻辑思维和自由的哲学研究与宣传,以提高国民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至于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展望,笔者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理论前沿》1998年第19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自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论著已有说明,故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之中,中国哲学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历史上,中国哲学曾有先秦末期的第一次大综合和明清之际的第二次大综合,现在正处于第三次大综合时期。王夫之在“天崩地解”的时代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之自觉进行了第二次大综合,形成了中世纪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当代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更应有“马列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感,进行第三次大综合,创建当代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为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做出新贡献。

(在2011年11月武汉大学召开的“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展开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历程”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刊《社会科学》(上海)2011年第4期)

^① 熊十力:《致刘静窗》(1951年12月2日),载《熊十力全集》第8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